

红军的救命菜
“黄花草”

刘毅珍藏近四十年的黄花草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两株风干了的小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这种高4.5厘米左右、有一定毒性的植物,却是红军过草地时的救命食物……

松潘草地处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海拔3500米以上,遍布沼泽。长征中的红军经过这里时,除了行路难和变化无常的天气,饥饿是红军面临的巨大困难。为了找吃的,红军还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由朱德领导,有老农也有医生。

然而,草地中的野菜是有限的,前面的部队把可以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面的部队再找到能吃的野菜就非常困难了。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到了第三次,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菇、毒草而死,仅在1936年7月22日的夜晚,就有140人在饥寒中牺牲了。

这时,有一定毒性的“黄花草”,因为食用后不会有生命危险,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煮沸,减弱毒性后将水倒掉,再放清水煮,吃起来有点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胀,拉绿水,手脚也会有些肿。尽管如此,战士们还是不得不以此充饥。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两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珍藏。1975年10月,刘毅将自己珍藏了近40年的两株野菜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据《老年生活报》

1974年七八月间,在北京七三八厂部分职工中,流传一本没有作者署名和出版时间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小说先在少数工人中传阅,后被刻写油印48册(每册160页,约8万字),在单位内外传阅。《第二次握手》虽是小说体裁,但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用的是真名真姓,如竺可桢、华罗庚、钱学森、王淦昌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还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工厂党委发现后,认为擅自传抄、翻印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读物等,是错误的。因此,当即制止继续翻印,对于已经散发出去的责令有关部门追查收回。

1974年10月11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960期,以“鲜明政治倾向”的语句——“一本坏书《第二次握手》在暗中流传”为标题,刊登内参,对有关情况向上作了反映。

内参1974年10月11日发出,12日,姚文元批示:“请找一本给我,并查一下作者是哪。”很快,书就送到了姚文元

中共党徽“镰刀锤头”的演变

在战争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徽图案一直处在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中共中央及各级组织有过多次明确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的规定和决议。但同时又受苏联国旗的影响,党徽图案也出现过“镰刀锤头”。

斧头劈开新世界,
镰刀割断旧乾坤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1933年9月,红三十军解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家地主宅院内。红军在宅院门楼两旁的石柱上篆刻了一副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巧妙嵌入了“镰刀斧头”,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用的印信标志,更多地体现为“镰刀锤头”图案。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镰刀斧头旗

新落成的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召开,会上通过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新颁布的国旗图案因为设计较为复杂,加之条件有限、通讯不畅等原因,并未能广泛使用,但党徽上的镰锤组合图形逐渐深入人心。

由“镰刀斧头”
到“镰刀锤头”

1943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并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有两个要点:一、仍以“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二、去掉原来旗帜上的五角星,以与苏联旗帜相区别。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会议上第一

次悬挂党旗。尽管两年前杨家岭会议作出的决定,党旗样式是“斧头镰刀”图案;但在七大会场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据地所出现的党旗党徽图案,基本上都统一于“锤头镰刀”,已经鲜见“斧头镰刀”图案。

1950年,中央组织部拟定党旗制作方案,规定“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镰刀斧头。旗杆套为白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文件的档案原稿,竟有9处将“锤”字改为“斧”字,但文件所附的设计图样使用的仍是“镰刀锤头”组合的图案。

195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党旗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左上角缀以黄色镰锤图案的红旗,旗上不另加中国共产党字样或其他记号”。195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党旗问题的批复》指出:“党旗上只有锤头镰刀,并无五星(苏联国旗上有五星),此点请注意。”这两个文件的发布,“镰刀锤头”的说法从此才固定下来。

据《人民政协报》

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位读者

“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在上海淮海路中路的宋庆龄故居中,陈列着一本埃德加·斯诺送给宋庆龄女士的1937年版《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与宋庆龄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能够前往陕北,顺利采访“红色中国”,并成就《红星照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斯诺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求帮助,以便到红军地区以后起码有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

经宋庆龄联系,斯诺与外籍医生马海德获得了可以前往陕北考察的确切信息。1936年春末,宋庆龄派人给马海德送去一封信,约他到寓所面谈,并对他说“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此后,宋庆龄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也就是后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的“王牧师”,在西安与他们接头并护送他们到陕北。

于是,斯诺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红

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就发行了五版。书中开篇所叙述的携带用隐形墨水准备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帮助等经历,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联络人之一便是宋庆龄。1938年该书在上海被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

虽然宋庆龄并没有参加过长征,但是其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给予了热情帮助,特别是帮助和促成国际友人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让全世界了解了真实的长征。据《新民晚报》

处。姚文元10月14日的电话指示:“这是一本很坏的书。它的恋爱故事,是形式、公开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按照姚文元的具体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内部治安保卫处(十处),“组织了五名干部,从十月中旬开始,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开展了追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市公安局十处于12月8日写出了“追查情况”报告。报告大体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小说在北京的传抄情况,“最早是1972年上半年传入北京的,原名叫《归来》,后改成《第二次握手》”。“分三条线索,在北京传抄,涉及十多个单位,收缴到三十九册”。再一部分是作者张扬的情况,当时张“在湖南浏阳县”。

作者张扬,因小说《第二次握手》1975年初入狱,坐牢4年,“内定死刑”。后因政治形势大变,于1979年初张扬平反出狱。据《党史博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当作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实际上,早在《西行漫记》面世前近一年的1936年春,就有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问世,连载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杂志上。

“廉臣”是谁?抗战初期,有人以他和斯诺都是美国人,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文刊登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陈云。

长征之前,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五军团踏上漫漫长征路。但在1935年6月上旬,中央派陈云到了上海。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透露,陈云是带着重要使命回上海的:一是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恢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

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住进了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馆。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一时间,工作难以展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后决定请陈云等人尽快赴苏联。

李海文说,《随军西行见闻录》便是陈云在上海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布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地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1.2万里的传奇经历。虽然全文只有短短的3万字,但写得生动活泼、真实可信。

陈云去苏联后,《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书稿也被带到苏联,最早于1936年春以连载的形式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据《文汇报》

何长工:
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

何长工,1900年12月生,湖南华容人。1919年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底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长工经组织安排,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工作。不久,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并设计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战过程中,他奉命到长沙联系上湖南省委,又到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使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取得了联系。

1929年6月,何长工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党代表,率部开赴鄂东南,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红五纵队由近千人很快发展到6000余人,一度比红五军其他四个纵队红军指战员的总和还多。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时,红五纵队编为红八军,何长工任军长。8月,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前委,他任总前委委员。

1931年秋,何长工在瑞金参与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秋,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何长工任两延河防司令员,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间,他创建了我军第一所“荣军教导院”。之后致力于军队教育事业,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教育长、副校长,为党和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据《党史文苑》

耿飏:
没授衔的国防部长

耿飏,1909年8月生,湖南醴陵人。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9月,耿飏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1933年春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二师前卫,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耿飏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1936年12月任抗日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耿飏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耿飏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华北地区的解放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根据中央决定,耿飏到外交战线工作,他是新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

1978年3月后,耿飏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是继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四位元帅之后的新中国第五任国防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没有授衔的国防部长。据《党史文苑》

姚文元下令追查《第二次握手》作者